

# 延安时期报刊对中医药的宣传

霍镜如



延安时期制作中草药药场景

延安时期，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规模、多角度、多形式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，普及卫生健康知识，促进公共卫生事业，推动边区社会进步。1945年4月24日《解放日报》第1版刊发社论《继续开展卫生医药运动》，对中医给予充分肯定。党报党刊主动担负中医药传播职责，广泛宣传中医药工作和中医药知识，提高群众觉悟与素质，中医药宣传普及成绩斐然。

## 卫生常识“走村入户”

陕甘宁边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、交通不便、经济现状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意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健康状况难以保证。虽然看病靠着中医，但却普遍缺乏正确的中医药常识，因此普及中医药知识、树立正确健康观念，成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的当务之急，借助报刊宣传普及便是重要途径。

《新中华报》《解放日报》多次刊发《重视防疫》《紧急的防疫工作》《夏季防疫工作》等社论、时评、建议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，并确定“卫生”专栏增加中医药方面文章，在编委中充实中医专家，中西医共同负责编辑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1941年《解放日报》开辟“卫生”专栏起，先后刊出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。陕甘宁边区卫生署也组织编写《农村卫生》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卫生知识小册子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。

中医药宣传以引导民众破除迷信、相信科学为主要内容，重在改造巫神，传播科学知识。1944年4月2日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《定边县参议员崔岳瑞倡导向下掌村破除迷信》，并配发社论《从卜掌村谈起》，指出：“在我们边区有像崔岳瑞这样的好医生，他不但医道高明，而且思想进步，这是很好的斗争”，10月4日刊登社论《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》，10月又刊发通讯《崔岳瑞和崔岳瑞运动》，宣传他坚持行医治病、破除迷信的文明作为，带动全边区形成反迷信运动的高潮。

边区中医药宣传教育的一大特色是以艺送医，采取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，把卫生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。卫生宣传部门在传统节目、农村

庙会等节点，通过秧歌、戏剧等文艺表演，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宣传教育，党报党刊也及时对所取得效果进行报道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边区还多次举办医疗卫生展览会，以实物、文字、图片、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，展示封建迷信危害，普及卫生防疫知识，社会反响强烈。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，展出实物659件、图画260张，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，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。展览会历时8天，参观人数达万余人，《解放日报》连篇跟进报道，宣传效果很好。

## 卫生健康宣传阵地

“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，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，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，同时解除西医缺乏的困难。”这是1941年5月30日《解放日报》刊载的报道《边区政府委员会讨论卫生工作》中引用的观点。

作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报，《新中华报》《解放日报》报道了许多党政军机关和领导关于中医药工作的会议、政策和活动，如《国医代表大会闭幕，国医研究会正式成立》《边区卫生处改造中药代替西药》《西北局召集各机关开会决定推进群众医药卫生》。同时开设专版专题专栏，加上利用特稿专栏、漫画口号等方式，发挥党报引领作用、营造氛围、舆论监督等作用，党报党刊成为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卫生健康宣传的主要工具，发表了多篇社论和理论文章。

《解放日报》《边区群众报》《关中报》及《新华日报》等媒体大量报道边区各地中医药工作的动态和成效，积极推动中西医结合，1944年4月30日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专访报道，他对记者说：“号召所有卫生干部打破宗派主义的观点，很

好配合中医，研究中医中药。”

和当时各地做法一样，边区中医也有保守“秘方”之旧习，墨守成规。党报党刊配合“中医科学化”，提倡公开“秘方”，相互学习，对全边区中医改造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《解放日报》针对当时防疫保健工作的需要，及时刊载民间验方和名医处方。1944年刊载了“柳拐子治法”；1945年刊载李鼎铭救治麻疹方、江思元提供治吐黄水病的“雷击散”中药方；1946年转载《关中报》发表的预防和治理黄水病办法，刊载《大蒜素的抗菌作用》《丁香治症》等科普文章。

《解放日报》开辟专栏，既介绍通俗科学知识以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，又发表医学论文为边区文教建设服务。如1941年10月4日开设“科学园地”专栏，1941年11月24日开设“卫生”专栏。1944年9月24日《解放日报》“农学知识”专栏刊登江心《森林有啥用处》，指出森林用处很大，其中就讲到树叶的药用（如柏树、五倍子），根的药用（如黄柏），果实的药用（如山楂、桃、杏、枣）等。

《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》于1942年8月至12月分4期在《解放日报》的专栏连载，是延安时期重要的、也是唯一的一部植物专业志。1944年6月《解放日报》又发表闻兰《边区药材介绍》，介绍麻黄、柴胡、甘草等33种药材。

## 报道模范推广中药

1944年7月1日《解放日报》报道：“本市著名中医李长春同志为群众服务的精神，为市民所一致称道，市政府决定在夏季卫生动员大会上提出奖励，并誉之为模范中医。”1944年12月10日《解放日报》报道边区政府副

主席李鼎铭在边区议会上的发言时指出：“崔岳瑞以医药破除迷信，收到了很大效果。”

边区中医药宣传教育，坚持群众路线，通过总结基层群众经验，树立群众身边典型，从群众中来，再到群众中去，引导群众自觉培养良好卫生习惯，推广群众卫生工作经验。在这方面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《刘建章手创医药合作社》《三边中西医药研究会的工作》《医疗队下乡工作的经验》等。

中医药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卫生下乡、卫生竞赛活动，边区推选卫生模范个人、卫生家庭、卫生模范乡等先进典型，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，《解放日报》给予多次宣传报道，如1944年报道《志丹三区合作药社周医生采集药材克服困难》《中医刘登英热心为群众治病》《赤水模范中医和平，背着药包走遍关中》等。

除此之外，党报党刊还登载中医药产品广告。《解放日报》常在显要位置做中医医师、中药材、中成药广告宣传，以满足各界对中医服务的不同需求，如1941年5月21日登载《光华药单价表》，1944年8月30日登载《介绍良医》，1944年9月8日登载《延安中医图书馆征集医药图书启事》，1944年11月6日登载《松鹤牌虎骨酒》，1945年5月18日登载《健康制药社两大贡献：“龙牌”仁丹、“松鹤牌”救急丹》，均刊发在该报第1版。

1945年8月28日，保健药社总社在《解放日报》第1版刊登启事：“本社为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起见，特购大批药材，炮制精良，售价低廉，欢迎各界多来惠顾。”

当时的主流媒体进行中医药商业宣传，对医药组织业务拓展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（作者单位：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院）

酒》。当时，梅兰芳在汉口刚结束演出，张馨派“大和轮”专程将他接至南通，亲自迎接，并在更俗剧场召开欢迎会，当晚又在“濠南别业”设宴接风。翌日，北派魁首梅兰芳与南派泰斗欧阳予倩在更俗剧场同台献艺，联袂演出，前后11天，剧场爆满，盛况空前。一出《游园惊梦》，一出《思凡》，精彩绝伦，艺惊通城，观众无不击节称赞，叹为观止。张馨每场必看，对梅兰芳精湛演技赞赏不已，梅兰芳每唱一出，他便赋诗一首，隽词妙句，让梅兰芳大为感动。

此后，梅兰芳在1920年和1922年，又应张馨之邀两次赴南通倾情演出，还为伶工学社延请教师，收学校高才生李斐叔为徒，更和欧阳予倩结为挚友。其中，1920年1月12日，梅兰芳抵达南通后，在更俗剧场连演3天，剧目有《天女散花》《玉簪记》《黛玉葬花》《嫦娥奔月》。1922年，为庆祝张馨七十大寿，梅兰芳第三次来到南通，6月19日晚演出后，次日又连演两场，剧目有《红线盗盒》《霸王别姬》和《洛神》。

20世纪初，南通的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，深情记忆了张馨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、欧阳予倩的交往和合作；梅欧阁更是见证了一代实业家与“南欧北梅”缔结友谊的感人佳话。此后，“梅欧阁”两边墙壁上，陆续张贴起梅兰芳、欧阳予倩各12幅剧照，梅东欧西，分别有《天女散花》《黛玉葬花》《千金一笑》《木兰从军》《嫦娥奔月》以及《宝莲送酒》《馒头姑佬》《晴雯补裘》等。南通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京剧教育和表演最温情、最宽厚的人文土壤之一。

## 鲁迅善待“尖锐批评”

王剑

文人轶事  
WENREN YISHI

1935年，清华大学在校生李长之写出长篇评论《鲁迅批判》，并在《益世报》文艺副刊连载。连载完，他将文章结集，准备在北新书局出版。出于尊重，李长之先把书稿寄给鲁迅过目，希望鲁迅能提出意见或建议。

《鲁迅批判》一书，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，将鲁迅作品与鲁迅的思想性格、内心世界联系起来，提出了许多新颖大胆的见解。除了夸奖外，李长之还专门辟出一节，直言不讳地列出“鲁迅文艺创作中的失败之作”，认为《头发的故事》《一件小事》《端午节》《在酒楼上》《肥皂》《兄弟》等小说“故事太简单”“独白过于单调”“空洞，沉闷平庸，语言不美，不亲切，不活泼，不紧凑，毫无意思，让人懒得看下去”，觉得“这几篇东西，写得特别坏，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”。李长之的批评言语尖锐，但字里行间透着一种“说好是真说好，说坏是真说坏”的真诚态度。

面对“无名小辈”李长之的尖锐批评，鲁迅先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生气。他认真审看了书稿，仔细订正了书中所提到文章的创作日期，还给李

长之写了回信，针对书中的观点说明自己的看法，认为措辞激烈、文章锐气过盛，总比“小心翼翼，再三修改稳妥当好处”。并随信寄上自己的一张标准像。

李长之收到鲁迅的信和照片后，感到很珍贵，就叮嘱北新书局将鲁迅相片按原尺寸置于封面左上方，再用插图重印一次置于卷首；还将鲁迅书信第一页手迹原件寄去，让排在插图相片之后。但北新书局老板担心此书不好销，印刷时省去了该用重磅铜版纸印制的相片插图和手迹，仅在封面印上了鲁迅的标准像。此书1936年1月出版，10月份鲁迅便去世了。然而令北新书局老板想不到的是，这本他打算赔钱的书竟然热销，不到半年就卖完了。1936年6月，《鲁迅批判》又出了第二版。

而今，在学术界，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仍然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。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的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，也是所有鲁迅研究论著中唯一一本得到鲁迅本人批阅并认可的著作。

面对“无名小辈”李长之的尖锐批评，鲁迅先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生气。他认真审看了书稿，仔细订正了书中所提到文章的创作日期，还给李

## 赵元任“永远不会错”

刘兴尧

文人轶事  
WENREN YISHI

著名的语言学家、音乐家赵元任是江苏省常州市人，现在常州的宣传语“教我如何不想她”，就是借用赵元任作曲、刘半农作词的歌曲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位于常州市青果巷的赵元任故居，有赵元任音乐厅和赵元任生平展，人们可以从更全面的了解赵元任。

赵元任曾任美国语言学学会的主席，一个母语是东方语系的人，担任西方语言学学会的主席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按照现在的说法，赵元任是跨界的牛人，横跨东方语系和西方语系。另外，赵元任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是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先导，他创立了一套以听说为核心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，为更好地指导外国人学习汉语，他用近20

年的时间写就英文版《中国话的文法》(又名《汉语口语语法》)，该书是超过800页的巨著，描写细致，分析清楚，在美国被公认为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，被张琨先生誉为汉语“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扛鼎之作”。

1946年普林斯顿大学在授予赵元任名誉博士学位时称颂道：“赵元任的研究成果能帮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、中国人民的理想和理想。”这个评价是很高的。在美国的语言学学者有句话：“Chao can never be wrong”(“赵元任永远不会错”)，全世界获得此等评价的，可能只有赵元任了吧。可以看出赵元任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，这也是国际语言学界对赵元任的崇高评语。

## 叶圣陶的“小题大做”

张雨

文人轶事  
WENREN YISHI

现代作家、教育家叶圣陶在担任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期间，国家正在推广普通话。众所周知，普通话的推广首先是从小学开始的，学校又是以中小学为基础的，中小学又是以语文教学最为关键的。叶圣陶自知身上的责任重大。因此，他严把每一篇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。

叶圣陶是江苏人，平时说苏州话较多。为了语言规范化，他要求文章入选课本前，需经北京语文老师朗读，以查验语句是否通顺，音节是否优美。

一次，一位老师为叶圣陶朗读文章，读得较快。叶圣陶打断他，指着课本上的语句问：“这句话到底是读‘东西掉到井里了’，还是‘东西掉井里了’？”

这位老师搪塞道：“我想这两种读法都一样。”叶圣陶接着问：“依你看也就是‘到’字在这里是多余的？”这位老师难为情地笑了笑，借故离开了。

叶圣陶为了找到正确答案，决定召开一个主题讨论会，确定一下

“到”字的应用。对于主任的决定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有人说：“为了一个字召开一个主题讨论会有必要吗？”也有的人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这是高射炮打蚊子——小题大做！”

见此情景，叶圣陶微笑着向大家解释：“大家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大家静下心来想想，我们编辑尚且拿不准的句子，怎么能印刷出来交给学生呢？这虽然只是一个字的小事，但关乎几百万中小学生的前途，就应该作为大事来对待。”

听了叶圣陶的解释，编辑们纷纷点头称赞，他们分头寻找资料，落实“到”字的准确用法。次日，讨论会开得很成功，与会者踊跃发言，大家详细介绍了“到”字在句子中的意义，在此句子中“到”有达于某一点，即到达的意思。因此，大家一致认为“到”字在这句话中有一定含义，不可随意删去。

为了一个“到”字召开一次主题讨论会，看似“小题大做”，其实是彰显了叶圣陶精益求精、恪守职责、严谨自律、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。

## 南通有个“梅欧阁”

周惠斌

张馨和梅兰芳相识于1914年。1917年，时年65岁的张馨赠诗24岁的梅兰芳：“老夫青眼横天壤，可忆佳人只姓梅。”抒写了内心对这位京剧天才的高度赏识，并多次写信给梅兰芳，表示自己将创办戏校，诚邀当时已誉满梨园的梅兰芳鼎力相助：“可奋袂而起，助我之成也。”彼时，中国戏剧界有“南欧北梅”之称，“南欧”指欧阳予倩，“北梅”即梅兰芳。梅兰芳非常感激张馨的信任，但他婉言谢绝。他在回信中说：“……代组学校，本应勉效绵薄，只以知识短浅，未克如愿，实深愧疚。”

1919年5月，张馨在戏剧家欧阳予倩的支持和协助下，在南通筹建戏剧学校。9月中旬，“南通伶工学社”成立，成为我国第一所培养京剧人才的新型戏剧艺术学校（以昆曲为基础，京剧为主体），张馨担任董事长，其子张孝若出任社长，梅兰芳为名誉社长，欧阳予倩就任主任并主持教学工作。欧阳予倩不仅学家从上海来到南通亲自教戏，还聘请了一批颇有名望的老师。

欧阳予倩随后提议，学校还应建造一家演出场所，作为实施戏剧改革的实验基地，并使之成为与伶工学社相配套的新型戏曲剧场。不久，张馨在南通城西南、桃坞路西端建造了“更俗剧场”，它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孙支厦仿上海新舞台设计，外观呈马蹄形，由观众

厅、舞台、四合院、演员宿舍等构成，所谓“更俗”，意指“更除恶习旧俗，树立文明新风”。

伶工学社成立后，梅兰芳在给张馨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……有予倩先生出



1922年6月19日，张馨与梅兰芳在南通合影。